

## 第二章、共黨國家意識型態演變的因素：

### 比較的視野

從上一章文獻回顧中，可以看出過去學者對共黨國家意識型態演變的原因，共分為黨內上層的權力鬥爭、下層的市場推動和蘇聯因素三種論點，這三種論點各有不足之處。本章透過比較的基礎，建立一個共黨國家意識型態演變的框架，說明意識型態變遷的因素、以及在不同階段所呈現的特徵。主要目的是從中提煉出導致中共「三個代表」的原因，以及凸顯「三個代表」在共黨國家意識型態發展中的特殊性。

這樣做的好處在於，透過比較的視野，能夠在建構理論之後，更深入的研究個別的國家。要精確解釋中共意識型態的變遷，就必需站在比較共黨國家的基礎之上，才能清楚的定位中共目前的轉變在共黨國家轉型過程中的位置為何。近年來隨著蘇聯和東歐共黨國家的相繼解體，學界對共黨國家意識型態的關注，就傾向將焦點置於中國大陸的個案之上。雖然中國大陸是現存社會主義國家的代表典型，對中國個案的深入瞭解必定具有關鍵意義。但是個案研究仍然難以避免研究設計上的先天缺憾，亦即個案畢竟是獨立存在，其獨特性往往使研究者很難從單一個案中建立理論性的通則。<sup>1</sup>因此本文採取個案取向的比較研究方法

(case-oriented methods)，利用少數的個案進行相互比較，將焦點置於個案的歷史淵源和結果，透過對歷史脈絡和證據的掌握進行詮釋，以建立適度的普遍化解釋。<sup>2</sup>

本章章節安排，第一節提出影響意識型態變化的因素，以「經濟結構—引入市場機制與否」和「領導互動—路線衝突與否」兩個變數作為切入點。第二節進一步分析兩個變數的互動結果下，可區分出四個意識型態的類型，並說明在完善

---

<sup>1</sup> B. Guy Peters 著，陳永方譯，*比較政治的理論與方法*，頁 159、177。

<sup>2</sup> Charles C. Ragin, *The Comparative Metho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31-35.

計畫經濟框架下的兩個類型。第三節接著說明當引入市場機制後，意識型態所呈現的另外兩個類型。第四節是本章小結。

### 第一節、影響意識型態演變的兩個因素

本文認為影響意識型態演變的因素，必需從「經濟結構」和「領導互動」兩方面來理解，目的在彌補過去單一因果關係的解釋不足。新制度主義認為，人並不是完全獨立於現實社會脈絡的個體，人的認知其實是「鑲嵌」(embedded)在既有的經濟環境、政治結構和文化信仰之中，其決策和利益的實現也與此相關。<sup>3</sup>歷史制度論進一步強調背景的作用，認為政治決策是各種因素複雜混和的結果，必需通過不同時間和文化背景中來理解利益的變遷。<sup>4</sup> Thelen 和 Steinmo 指出政治變遷的原因，是社會經濟或政治的脈絡產生了巨大的改變，造成了潛在制度突變的情境。社會、經濟脈絡中或政治權力的改變，造成行動者可以透過既存的制度去追求其目標。外在的政、經、社的改變，造成既有制度中原有的行動者既定的目標或策略轉移，行動者調整其策略以適應改變，而此種改變可能造成制度崩潰，也可能只是在制度限制下形成逐漸、點滴的改變。因此當觀察到一個政治變遷的現象時，需要思考現象背後的時空脈絡，變遷的動力必定來自於廣泛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的改變。<sup>5</sup>換言之，政治結果很少只來自唯一的因素，制度、社會經濟發展和思想變化，都可能產生影響。<sup>6</sup>

在此邏輯之下，就正如鄒讜所言，「宏觀結構基礎」上的「微觀個人選擇」是社會經濟結構到政治轉型的過程的基礎。<sup>7</sup>意識型態的修正既不是對社會世界

<sup>3</sup> Victor Nee and Paul Ingram, "Embeddedness and Beyond: Institutions, Exchange,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Mary C. Brinton and Victor Nee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8), p.30.

<sup>4</sup> Ellen M. Immergut, "The Theoretical Core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s & Society*, vol. 26, no.1 (Mar. 1998), pp.22-28

<sup>5</sup> Kathleen Thelen and Sven Steinmo.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6-17.

<sup>6</sup> Peter Hall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ree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vol. 44, no. 4(Dec. 1996), p. 942.

<sup>7</sup>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

的靜態反應，也不是強加到現實的理論框架，而是一系列行動的結果，<sup>8</sup>這就超越了過去單一決定論的解釋範疇。當共黨國家領導人做出意識型態的新詮釋時，必然和他當時所處的經濟政治背景息息相關，故需要關注行為者在制度環境中的決策。

中共提出「三個代表」的背景，是「經濟結構」和「領導互動」兩個自變項交互影響的結果。選擇這兩個變數的原因，是因為它們交互作用的結果，可以用來解釋所有共黨國家的意識型態演變。亦即，「經濟結構—引入市場機制與否」和「領導互動—路線衝突與否」的互動形式，涵蓋了共黨國家意識型態的發展特徵，以此來解釋「三個代表」的產生，可以獲得更全面的分析。以下依序說明這兩個變數。

### 第一個變數：「經濟結構—引入市場機制與否」？

由於計畫經濟體制本質上會導致無效率的情況，改善的方法可分為不引入市場機制的「完善控制」（“perfection” of control）和引入市場機制的改革。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運作是在史達林時期確立下來的，由產權公有制和計畫經濟組成，<sup>9</sup>追求高速度發展，榨取農業和民間消費，集中投資重工業。透過高度集中的計畫經濟來調配所有收歸國有的生產資料，經濟的推動力不是利潤而是生產指令。無論是宏觀、中觀和微觀的經濟決策均由國家統一決定，由於決策權歸於國家，國家由黨掌控，所以實際權力集中在黨的領導集體和領袖個人。<sup>10</sup>

這樣的制度設計具有先天的缺陷，首先，會有資訊不完善的問題，由於計畫經濟指標的制訂和落實必須仰賴完善的資訊傳遞，否則就會脫離現實。但是由上而下的行政措施，造成龐大而重疊的管理機關，造成決策上的失誤。此外在國家

---

頁 206。

<sup>8</sup> 鄒謙，*中國革命再闡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 134。

<sup>9</sup> 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80-181;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頁 16。

<sup>10</sup> 王長江、姜躍等著，*現代政黨執政方式比較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 186-188。

要求經濟快速發展下，官員和企業負責人最會對本身的企業產能保留和隱藏，傾向運用更多的資源來執行簡單的指標任務，造成資源和產出的落差。<sup>11</sup>其次，缺乏激勵的機制，計畫經濟假定國家和社會全體是有單一利益的，由國家代表社會下達經濟決策指標，企業的權限很小，只能照章辦事。但是事實上社會不同行動者有各自的利益需求，以執行計畫的官僚來講，他們著重的不只有國家利益，還有自身權力地位的追求，因此國家單一利益的決策缺乏激勵所有行動者的誘因。<sup>12</sup>最後，經濟成長的方式屬於外延式增長(extensive growth)，透過國家大量的生產要素投入來取得帳面上的增長率，例如增加就業率和延長工作時數，但是隨著資源日漸緊缺，這種高速度增長很難持續下去，經濟發展勢必趨緩及停滯。<sup>13</sup>

由於計畫經濟和公有制的運作會導致經濟發展的無效率，提昇效率的方式可以分為兩種，一是繼續在社會經濟體制的大框架下設法達到「完善控制」，二是突破社會主義框架引入市場機制進行改革。第一種方式「完善控制」，只有觸及到官僚協調機制，透過行政命令和技術性的修正，例如機構重組、企業合併和加強計畫決策的科學性等方式來改善計畫經濟。<sup>14</sup>由於「完善控制」沒有觸及政治結構的改革，無法解決計畫經濟中資訊不完善和缺乏誘因的缺失，蘇聯運用現代技術和科學模型來編制計畫，在技術上已經達到盡善盡美，但仍然從 1970 年代後進入長達 15 年的經濟停滯。<sup>15</sup>在此情況下就產生了第二種改善經濟的方式：突破社會主義框架引入市場機制。即利用市場經濟的價格機制來呈現資源的稀缺程

<sup>11</sup> 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p.121-124, 127-130; 吳敬璉, **當代中國經濟改革**, 頁 23; 錢俊瑞主編,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縱橫談** (北京: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83 年), 頁 292-293。

<sup>12</sup> 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p.121-124, 127-130; 吳敬璉, **當代中國經濟改革**, 頁 118-121; 錢俊瑞主編,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縱橫談**, 頁 292-294。

<sup>13</sup> 經濟成長的方式分為外延式成長(extensive growth)和內涵式成長(intensive growth)，當生產要素短缺時，必須轉向內涵式成長，進行科技的研發、人力技術的發展、組織改良、重質不重量…等，才能使經濟再度成長。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p.180-186; 吳敬璉, **當代中國經濟改革**, 頁 26。

<sup>14</sup> Konai 將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體系區分為五個環環相扣的組成部分，從核心至外圍依序是政治結構（官方意識型態和一黨專政）、產權公有制、官僚協調機制、行為者行動和經濟現象，改革的深度視國家觸及的組成部分而定，越接近核心則轉型幅度越大。Janos Kornai,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sm*, pp. 360-365, 387-392, 396-408, 565。

<sup>15</sup> 吳敬璉, **當代中國經濟改革**, 頁 27-28。

度，增加資訊的透明度讓社會成員能做出正確決策，同時市場競爭能有效降低監督成本，使交易成本降低而達到有效率的資源配置。<sup>16</sup>

至於如何區分「完善控制」和「市場化改革」的界線，按照吳玉山的觀點，以是否牽涉產權改革作為分水嶺。市場化可以被視作國家放棄控制權的過程，從初級市場化開始，國家把生產工具的控制權交給企業；而沒有放棄控制權的調整和完善，就屬於計畫經濟體制內的改革。<sup>17</sup>在共黨統治時期的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絕大部分經濟改革，都屬於在計畫經濟內採取行政改革的完善控制，例如蘇聯 1965 年科錫金改革、1973 和 1979 年布理茲涅夫的企業重組，或者東德在生產部會和企業間創立企業集團，以及中國大陸毛澤東時代的「收放循環」皆屬此範疇。在市場化改革的範疇，中國大陸 1984 年由農村推進到城市和工業後，推出了初級市場化的改革，1988 年「治理整頓」結束後，開始已建立完全的市場化作為經濟改革的目標。<sup>18</sup>

引入市場機制進行改革，能改進舊有計畫經濟體制的弊端，提升經濟效益。中央計畫經濟逐漸衰落，經濟活動朝著市場化和國際化的方向發展，隨著經濟持續成長，收入水準也大幅度提升，生活素質在許多方面獲得改善。但是在引入市場後，也會帶來負面的影響。首先，會造成意識型態的理想和現實社會經濟發展矛盾的現象。共黨國家的建立是立基於幹部和群眾對共產主義的信仰，相信共產世界的到來，將會是一個優於資本主義的天堂。但是當國家開始引入過去被視為萬惡淵藪的私有制和市場時，無疑會衝擊人民長期以來的信仰價值，進而質疑國家施政的合理性。

其次，造成國家能力的下降。過去共黨國家是紀律嚴明的體制，完全控制生產資料，透過從政治中心到社會組織的嚴明紀律，把就業機會分配給那些忠於自

---

<sup>16</sup>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頁 24。

<sup>17</sup>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頁 42。

<sup>18</sup>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頁 38-40。

己的人。但是當國家不再壟斷所有生產資料後，非集體化農業、地方政府企業、私人以及外資的興起，都瓦解了國家獨斷的根基。國家對就業的控制被削弱了，黨組也不再要求成員保持高度的忠誠和嚴格的紀律。<sup>19</sup>

第三，打破階級二元對立，社會趨向流動、多元化。職業、地位的社會流動增強，文化的多元性和異質性亦顯著增加。市場運作爲個人的自主性創造了更有利的機會，多種經濟成分的並存打破了按政治標準分配的原則。許多人可以逐漸放鬆的勞動力市場中謀求發展機會，或者在私有企業中立足謀生，從而擺脫了政治的控制。經濟的私有力量儘管發展有限，但仍不失爲一種重要的新生力量，在共黨統治下，私有力量一旦重新出現，很難想像它會被再一次消滅掉，而且並將成爲社會自主自治運動越來越重要的支持力量。<sup>20</sup>各種公開或非公開形式的社會和政治衝突加劇。收入差距擴大、環境污染和惡化、政治腐敗的蔓延，種種不受規章約束和違規的行爲，在個人、群體和組織持續擴散，反應社會的可治理性（governability）衰減。<sup>21</sup>

## 第二個變數：「領導互動—路線衝突與否」？

「路線」是指共黨爲完成一定歷史任務而確定的基本方針與指導原則，<sup>22</sup>視路線爲「總的、根本性的、全局性的指導方針」<sup>23</sup>，其涵蓋性與重要性高於政策的層次。所謂路線鬥爭，是在政策執行過程中產生「左」、右的偏差，這種偏差會引起高層的權力鬥爭，領導人上綱到路線的層次形成路線鬥爭。馬克思理想中的共產革命，理應發生在高度資本主義的國家，但在實踐上，共黨政權卻建立在

<sup>19</sup> Walder, Andrew (魏昂德) 著，方慧容譯，「現代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研究：從描述現狀到解釋變遷」，涂肇慶、林益民主編，**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西方社會學文獻評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69。

<sup>20</sup> 蘇紹智等，「中國的公民社會的發展趨勢」，周雪光編，**當代國家與社會關係**（台北：桂冠，1992年），頁90-99。

<sup>21</sup> 涂肇慶、林益民主編，**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西方社會學文獻評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導言。

<sup>22</sup> 景杉，**中國共產黨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年），頁81。

<sup>23</sup>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註釋本**（修訂）（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430。

低度發展的國家之中。由於共黨建政時國內環境的發展程度皆很落後，首先面對的問題就是如何以社會主義建設來改善國家現狀；但是隨著社會主義計畫經濟體制的先天缺憾，又面臨如何改良既有制度的問題。在此過程中，就會產生「左」、「右」路線的衝突，中共黨史上「左」、「右」兩條路線的鬥爭是長期存在的政治現象，在不同時期對「左」與「右」的解釋也會有所不同，<sup>24</sup>路線之爭的情況在其他共黨國家亦然。

政治路線的衝突與否，會產生截然不同的現象。路線共識時，黨內的向心力容易凝聚，形成一致的目標，且會執行貫徹既定的目標。例如中國大陸在大躍進和文革時代，全黨皆對向共產主義過渡懷抱理想，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相反的，路線有衝突時，則會出現相互對立的派系鬥爭，以爭奪意識型態主導權來鞏固政治權力。隨著派系勢力的消長，會使意識型態呈現不同的訴求，進而左右了某項特定經濟政策的建立或改變。例如毛澤東死後，中共黨內路線爆發衝突。華國鋒、鄧小平兩派意識型態的立場針鋒相對，各自擁護「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除了引發繼承人的權力爭奪戰，也影響毛後中國經濟建設的不同走向。鄧小平雖然推開改革開放的大門，但是在 1980 年代仍面對另一個革命元老陳雲的強力抵制，兩個陣營的對戰結果左右了意識型態的鬆緊程度，常使市場化的腳步忽快忽慢。

領導人的路線鬥爭經常和經濟政策密切相連。以蘇聯為例，有主張改革的赫魯雪夫、科錫金和安得洛波夫，他們試圖增減或修正生產指標與產品價格；也有保守派的布理茲涅夫，只願意接受幅度更小的變動。戈巴契夫時代的頭三年（1985-1987）進行體制內的改革，之後開始引進市場機制。中國大陸的政治路線衝突更加顯著，在毛澤東時代主要是追求高速成長的極左派和追求穩定的官僚改革派，在鄧小平時代則成為市場改革派與一貫主張穩定為先的官僚改革派。<sup>25</sup>

---

<sup>24</sup> 趙建民，**當代中共政治分析**（台北：五南出版社，2004年），頁 27。

<sup>25</sup> 吳玉山，**遠離社會主義：中國大陸、蘇聯和波蘭的經濟轉型**，頁 51、98-99。

伴隨政治路線衝突而來的政策立場，能否獲得延續或改變，必須要從高層領導人本身的「權力來源」來分析。領導人的權力來源可以分為「個人權威」(personal authority) 或「職務權力」(institutional power)，前者來自本身在國家歷史發展過程中獲得的威望；後者來自其在政府、政黨內占有的職務。<sup>26</sup>在共黨國家建立的過程中，從革命出身的開國元老享有歷史賦予的聲望，在主政時就成為具有個人權威的領導人，有讓追隨者臣服於領導的「卡里斯瑪」特質，使統治權威不受挑戰，<sup>27</sup>因此具有個人權威的領導人，比較有能力建立新的制度建設。相反的，職務權力是屬於可轉移的權力，喪失某個職務就會失去因該職務賦予的資源與權力。因此依賴職務權力的領導人，在上任初期需要時間累積個人威望，而在離開職務後很快就會喪失決策影響力，較不容易推行新制度或改變既有制度，只能延續既有的制度框架。以下試舉幾個共黨國家領導人的例子驗證說明之。

古巴具革命功勳的領袖卡斯楚，<sup>28</sup>雖然面對外界強大的改革的壓力，但是他本身沒有改革的意願，也能憑藉個人權威而堅持不改革。例如卡斯楚為了抗拒蘇聯民主化的壓力，在 1987 年 1 月實行全國經濟緊縮政策，宣布不照抄蘇聯改革類型。<sup>29</sup>1990 年代在美國經濟封鎖下，雖然開始進行改革，但是仍堅持社會主義的道路和制度不被侵蝕。1997 年 10 月五大重申堅持共產黨領導，不搞多黨制，堅持社會主義，反對復辟資本主義。<sup>30</sup>

南斯拉夫的狄托具有個人權威，他在任內順利推行許多改革政策；但後繼者卻只具有職務權力，無法推動新一波的改革來渡過政治經濟危機，最終導致國家解體。南斯拉夫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由狄托所建立，在他主政時國家的獨立路線

<sup>26</sup>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頁 186；Lowell Dittmer, "Bases of Power in China: A Theory and Analysis of the Fall of the 'Gang of Four'," *World Politics*, vol.31, no.1(October, 1978), pp.29-32.

<sup>27</sup> 對「卡里斯瑪」特質的討論，見 Max Weber 著，康樂編譯，**支配的類型**，頁 3-7。

<sup>28</sup> 卡斯楚所成立「7·26 運動」的革命組織，在 1959 年 1 月擊敗親美的巴蒂斯塔獨裁政權，使他具有個人權威。

<sup>29</sup> 徐世澄，「卡斯特羅和古巴的社會主義實踐」，**拉丁美洲研究**，1996 年第 4 期，頁 33-34。

<sup>30</sup> 趙匯，「卡斯特羅與古巴的社會主義改革」，**求實**，2004 年 10 月，頁 80-81。

獲得成效與支持，1950 年到 1960 年代初期南斯拉夫類型的經濟成果很好，1965 年繼續引進市場化經濟。但是在 1980 年狄托死後，新政府試圖推行有別於狄托主義的新政策，<sup>31</sup>卻遭遇重重困難而使國家陷入分崩離析的狀態。南斯拉夫是多民族的聯邦，南共聯盟彼此之間持集權和分權意見者僵持不下，而黨又缺乏強而有力的集中機制，各邦爲了自身利益而削弱了列寧式政黨的應有的向心力，呈現嚴重的民族分裂。<sup>32</sup>黨在面臨民族問題時無法確定分權的限度爲何，無法做出有效的措施，最終導致解體。<sup>33</sup>

蘇聯的政治經濟體制是由具有個人權威的史達林所樹立，<sup>34</sup>赫魯雪夫之後的領導人只有職務權力，只能稱爲「同儕中的第一人」，必須由集體領導來進行決策，並且使權力趨於分散，<sup>35</sup>他們無力改變既有制度，只能延續史達林類型。史達林在意識型態上啓動快速建設社會主義的進程，1936 年宣布建成社會主義，並逐漸向共產主義過渡。赫魯雪夫繼承了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原理，還制訂了一個具體的時間表，在 1961 年 10 月 17 日蘇共二十二大黨綱中規定二十年內建成共產主義的目標。<sup>36</sup>布理茲涅夫雖然以「發達社會主義」取代了赫魯雪夫的「兩個

---

<sup>31</sup> 1980 年 1 月狄托發表新年獻詞，等於是他對世人的遺囑，在遺囑中強調集體領導的重要性，提到「實行集體工作和集體負責的重要性」。狄托逝世後兩週，聯邦議會討論修改憲法事宜，在任期制方面多數委員贊成長期制，少數堅守狄托的原則。1982 年十二大組成以普拉寧茲爲聯邦行政會議主席的新政府，批准 29 個行政會議成員，其中只有 3 人是前任閣員。鄭學稼，**南斯拉夫史**，下冊（台北：帕米爾書店，1985 年），頁 422、429-432；Wolfgang Hopke, "Party Monopoly and Political change: The league of communists since Tito's death," in Pedro Ramet, *Yugoslavia in the 1980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pp.31-51.

<sup>32</sup> "The Early Post-Tito Years," in Glenn E. Curtis edited, *Yugoslavia: a country study* (Created: Washington, D.C.: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3rd ed, 1992).  
[http://lcweb2.loc.gov/cgi-bin/query/r?frd/cstdy:@field\(DOCID+yu0131\)](http://lcweb2.loc.gov/cgi-bin/query/r?frd/cstdy:@field(DOCID+yu0131))

<sup>33</sup>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Glenn E. Curtis edited, *Yugoslavia: a country study* (Created: Washington, D.C.: Federal Research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3rd ed, 1992).  
[http://lcweb2.loc.gov/cgi-bin/query/r?frd/cstdy:@field\(DOCID+yu0125\)](http://lcweb2.loc.gov/cgi-bin/query/r?frd/cstdy:@field(DOCID+yu0125))

<sup>34</sup> 在列寧死後，史達林先在 1926 年打倒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取得最高領導人的職位，繼而在 1929 年打倒布哈林取得意識型態的主導權，放棄新經濟政策實行高速工業化和全盤農業集體化。接著在 1937 年進行「大整肅」，殺戮革命世代的領導人建立個人無上的權威。過程參見陸南泉等主編，**蘇聯興亡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318-387。Evan Mawdsley, *The Stalin years: The Soviet Union 1929-1953*(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00-108.

<sup>35</sup> Archie H. Brown, "Policy-Making in the Soviet Union," *Soviet Studies*, vol.23, no.1 (July 1971), p.125.

<sup>36</sup> "The Party Program as Adopted by the Congress-I,"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ol.13, no.45 (Nov. 6-12, 1961), p.3.

十年過渡到共產主義」，<sup>37</sup>但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任務仍被保留。安得洛波夫與契爾年科雖然轉向較為保守的「發達社會主義的起點」，但兩人執政時間過於短暫而無法看出成效。戈巴契夫上台之後，試圖引入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改變史達林類型，提出「加速經濟發展」策略，批判片面追求公有制，改變對商品經濟的偏見。但是因為個人權威不足，難以推行大幅度改革，先後引起激進改革派和教條派的反彈，最終走上蘇共解體一途。

本節提出以「經濟結構—引入市場機制與否」和「領導互動—路線衝突與否」兩個變數作為分析共黨意識型態演變的基礎。下一節將進一步說明兩個因素的互動結果如何影響意識型態的表現內涵。

## 第二節、兩種完善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類型

上一節說明了本文自變項有「經濟結構—引入市場機制與否」和「領導互動—路線衝突與否」兩個變數，本節進一步將兩者的互動結果加以分類，建立一個類型學（typology）的解釋模型。<sup>38</sup>分析出這四種類型的目的，是希望能更全面的解釋自從共黨國家建政以來，意識型態隨著經濟發展與政治變動，所呈現的多樣化現象。<sup>39</sup>兩個變數各自會有兩種表現形式，經濟上引入市場機制與否會有「未引入」和「引入」兩種可能；領導互動路線衝突與否會有「共識」和「衝突」兩種可能，交互作用後可切割出意識型態的四種類型：手段對立、理想化、社資本質對立和空洞化。

<sup>37</sup> 1966年11月，布理茲涅夫俄共革命50週年紀念會上提出「發達社會主義」，指出只有已發達社會主義國家才有條件向共產主義過渡。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必需經過三類型—過渡時期、不成熟的社會主義、發達的社會主義，在發達社會主義的特色是生產力不斷提升，而蘇聯在1967年已經「建成了」發達社會主義。1971年3月二十四大，宣布發達社會主義已在蘇聯建立，成為官方意識型態。周尙文，葉書宗，王斯德，**蘇聯興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發行，1993年），頁636-638、652-653。

<sup>38</sup> 類型學（typologies）不同於分類學（taxonomies），後者不包含變項間的互動，沒有前者精細。B. Guy Peters 著，陳永方譯，**比較政治的理論與方法**，頁15-16、94-96。

<sup>39</sup>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期，共黨國家歷經巨大變革，反應在意識型態論述上更顯地多樣化，有的已經揚棄社會主義價值，例如蘇聯和東歐集團；有的是選擇性採納，例如中國和越南；有的仍然堅持不願大幅度改變，例如古巴和北韓。

本文做這四種類型的切割，是爲了凸顯共黨國家在不同經濟政治背景下，意識型態所呈現的不同特徵。<sup>40</sup>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之中，隨著國家經濟發展程度和政治環境的變動，共黨國家可能會歷經一個以上的類型。但是四個類型彼此之間的關係不必然是直線性的發展，不一定按照順序由類型一演變至類型四。共黨國家意識型態的四種類型如表一所示：

經濟結構		路線衝突	
		衝突	共識
引入市場機制	未引入 完善控制計畫經濟	類型一：手段對立 * 社會主義的價值和本質不變，爭論建設社會主義的速度和方式 * 口號經常與現實脫節 * 例：1960 至 1970 年代的中國，以及 1920 年代、1960 年代的蘇聯。	類型二：理想化 * 以理想改造現實； * 高度動員、大規模公有制、極端平等 * 例：強人領導下抗拒改革的國家。以及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1930 年代的蘇聯。
	引入 脫離社會主義框架	類型三：「社」、「資」本質對立 * 引入市場機制尋求改革計畫經濟的弊端； * 隨著改革派或保守派的勢力，消長，呈現左、右的擺盪 * 例：匈牙利、南斯拉夫、1980 年代的中國、蘇聯、和越南。	類型四：空洞化 * 和原始馬克思主義漸行漸遠，轉向服務於經濟社會現實 * 社會形成自主推動改革的力量 * 例：1990 中期以後的中國、越南。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本節先說明在完善計畫經濟框架下的類型一與類型二。

### 類型一：經濟上採取完善控制計畫經濟，但是領導人政治路線有衝突。

共黨國家大多是建立在工業落後的國家，建政之後，雖然領導階層都承認社

<sup>40</sup> 本文選擇蘇聯、中國、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匈牙利、羅馬尼亞、北韓、古巴、越南 9 個國家作爲驗證理論的個案對照，其中又以中國和蘇聯爲主。原因有二，第一，東歐許多國家是蘇聯的附庸國，深受蘇聯改革路徑的影響，因此可以從蘇聯個案來涵蓋理解大部分的東歐國家。第二，共黨國家中發展路徑和蘇聯不同的國家，必需要挑選出來加以探討。包括東歐國家中和蘇聯關係較不密切的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匈牙利、羅馬尼亞四國。以及現存的共黨政權中國、北韓、古巴、越南四國。其中中國是現存共黨國家中，意識型態發展最偏離原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解中共政權的改革對分析現今社會主義國家的存續至關重要，因此文中探討的比例也較高。

會主義的價值框架，但是對建設社會主義的速度和方式卻有所爭論。此類型的特徵有二，第一，領導人不懷疑社會主義的最高價值，只是對建設社會主義的手段意見不一。第二，領導人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手段對立和權力鬥爭有關，因此意識型態的爭辯也經常成爲領導人的施政口號。

首先看第一個特徵，領導人在承認社會主義價值下，對建設手段的分歧，大致上可分爲充滿烏托邦色彩的「極左派」，和主張穩定發展的「改革派」。極左派掌權的時候，傾向用群眾動員的方式，在計畫經濟結構下，積極調動生產因素，追求以重工業爲主的經濟高速成長。但是這樣的生產方式，卻高估了群眾熱情能轉化爲實質經濟效率的能力，容易造成資源浪費和行政命令上的盲點，反而使生產力下降，造成經濟危機。穩定改革派掌權時，傾向採取較爲溫和的手段，以休養生息來調整國民經濟發展。但是穩定改革派的折衷政策，卻成爲極左派攻擊他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箭靶。因此兩派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爭論不休。

舉例來講，1960 至 70 年代的中國，以毛澤東爲主的極左派，與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爲主的穩定改革派在意識型態上差異頗大。毛澤東主持的大躍進釀成 1960 年的大飢荒後，劉少奇等人掌握經濟決策權，從 1963 年到 1965 年進入國民經濟調整期，恢復大躍進失敗後的經濟。但是 1966 年毛澤東和林彪又開始凝聚力量，推行文化大革命大搞「窮過渡」。在經濟再度衰退後，1971 年周恩來等改革派又開始調整經濟，提出「四個現代化」。

接著看此類型的第二個特徵，意識型態的論述時常成爲領導人的施政口號，只有字面上的不同，但不一定會落實到現實社會之中。極左派和主張穩定發展的改革派領導人，提出不同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式時，雖然是著眼於國家發展藍圖的規劃，但同時也具有權力爭奪的動機，希望透過爭奪意識型態的主導權，來打倒政敵鞏固政治權力。在此情況之下，意識型態的論述轉變，就不必然落實到對人民社會的承諾。

舉例來講，1924 年列寧死後，蘇聯領導人對新經濟政策的存廢問題激烈鬥爭，<sup>41</sup>史達林在這場爭辯中立場前後不一。持「不斷革命論」的托洛斯基和季諾維也夫反對繼續新經濟政策，而提出「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史達林則和布哈林結盟捍衛新經濟政策。<sup>42</sup>爭論的結果由擁護新經濟政策的史達林和布哈林獲得勝利。<sup>43</sup>但是史達林並沒有真正擁護新經濟政策，反而在 1929 年鬥倒布哈林，放棄新經濟政策強制實行高速工業化和全盤農業集體化。<sup>44</sup>可見史達林的立場一開始是反「左」，但在打倒政敵後又搖身一變成爲更「左」，意識型態的立場不必然代表對社會的承諾。

意識型態在這個類型中脫離現實的現象，也出現在蘇聯 1960 年代赫魯雪夫和時期，所提出「二十年過渡」、「全民黨」、「全民國家」的理想型陳述。赫魯雪夫主張向共產主義過渡，曾批評政敵莫洛托夫所提出的「初階論」。<sup>45</sup>1961 年蘇共二十二大通過新共產黨綱領，進一步提出要在「二十年內基本上建成共產主義」，<sup>46</sup>並指出由於剝削階級被消滅，國家鎮壓反抗的職能也就消亡了，在新的類型中變成全民的國家，工人階級的共產黨也變成蘇聯人民的先鋒隊和全體人民的黨。<sup>47</sup>章程中第一章第一條指出「任何蘇聯公民，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都可以成爲黨員」。<sup>48</sup>然而事實上，號稱「全民黨」的蘇共仍然強調共黨的領導地位，

---

<sup>41</sup> 列寧在 1921 年 3 月 8 日十大後實施新經濟政策，內容是下放大部分企業權力，在計畫經濟下恢復市場制度，擴大企業自主權，通過自由貿易刺激農業。撤銷最高經濟委員會所屬各管理總局，將大部分國營企業聯合組成托拉斯，推行經濟核算制。周尙文，葉書宗，王斯德，**蘇聯興亡史**，頁 73、122。

<sup>42</sup> 陸南泉等主編，**蘇聯興亡史論**，頁 353-359。

<sup>43</sup> 陸南泉等主編，**蘇聯興亡史論**，頁 353-359。

<sup>44</sup> 1927 年出現糧食收購危機，布哈林和史達林進行意識型態爭論，史達林認爲是因爲黨組織工作不力和富農的破壞所造成，於是發動「反右傾鬥爭」，1929 年將布哈林逐出政治局。周尙文，葉書宗，王斯德，**蘇聯興亡史**，頁 253-257。

<sup>45</sup> 莫洛托夫曾在 1955 年 2 月 8 日最高蘇維埃會議上提出「初階論」，但在當時並沒有被赫魯雪夫採用，甚至在 1956 年 2 月二十大上批判「初階論」。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七十年**，第三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年），頁 38-39。

<sup>46</sup> 第一個 10 年（1961-1970）要在物質技術基礎上超越美國，在第二個十年（1971-1980）要達到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The Party Program as Adopted by the Congress-II,”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ol.13, no.46 (Nov. 13-19, 1961), pp.3-4.

<sup>47</sup> “The Party Program as Adopted by the Congress-II,”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pp.11-12, p.46.

<sup>48</sup> “The Party Program as Adopted by the Congress,” *The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 vol.13,

不願大量新收新黨員，共黨成員仍佔人口中極少的成分，全民黨仍是無產階級的黨。<sup>49</sup>蘇共宣布社會主義建設完成的論述完全和社會經濟現實脫節，1955 年到 1963 年之間，蘇聯的國民收入增長逐年下降，1961 年蘇共二十二大宣布社會主義建設完成時，國民收入也沒有起色。<sup>50</sup>足見宣布社會主義建設完成和國家消亡、黨消亡的論述脫離社會經濟現實。

### 類型二：經濟上採取完善控制計畫經濟，領導人政治路線也有共識。

在計畫經濟框架中，而政治路線共識的情況下，意識型態的特徵是領導人以建設共產天堂的理想來改造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是基於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相信社會主義將會帶來一個優於現存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活方式，出於對這套意識型態的堅實信仰，讓統治者與大眾相信本身的從屬地位，凝聚了彼此之間的向心力。共產黨肩負起依據這套意識型態改造社會的責任，以「應然」來改造社會的「實然」，意識型態扮演指導性的角色。

在此類型中，領導層對社會主義信仰的共識很強，因此在推動社會主義建設時傾向用激烈的方式來進行改造，呈現國家機器高度動員社會資源、推行大規模公有制經濟，和強調極端平等主義等特色。由於調動國家和群眾的一切生產資源，往往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宣稱達成社會主義的「類型性任務」，例如宣布公有制經濟達成一定的比例、宣稱消滅剝削階級…等。

意識型態屬於「類型二」的共黨政權，有那些在政治強人的領導下，堅持原始社會主義理想，且抗拒改革的國家，例如古巴、北韓、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古巴、北韓至今仍拒絕進行大幅度的改革，還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黨內沒有反對的聲浪。卡斯楚雖然在 1970 年代至 80 年代曾經放寬了一些經濟政策，但是

---

no.47 (Nov. 20-26, 1961), p.3.

<sup>49</sup> 周尙文，葉書宗，王斯德，*蘇聯興亡史*，631-632。

<sup>50</sup> 1955 年到 1963 年之間蘇聯的國民收入增長率依序為：1955 年 11.9%、1956 年 11.3%、1957 年 7%、1958 年 12.4%、1959 年 7.5%、1960 年 7.7%、1961 年 6.8%、1962 年 5.7%。詳細資料見 Edward A. Hewett, *Reforming the Soviet economy: equality versus efficien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8), p.226.

1986年三大召開後不久，就宣布在經濟上要掀起一場「揪偏運動」，避免重新出現新的資本家。<sup>51</sup>1991年蘇聯解體，卡斯楚開始改革，但停留在「利用」資本主義來鞏固蘇維埃政權，以市場調節來給原有體制輸血，不打算全面引進市場機制。<sup>52</sup>北韓自建政以來堅持獨立自主性，抗拒外來的改革，1990年代以後雖然經濟停滯，但仍歸咎於前社會主義集團經援減少以及自然災害，不願進行改革。1997年金正日繼任成為中央總書記，但指導原則「紅旗思想」仍重申依靠自己的力量把革命進行到底，在體制不進行根本性改革的前提下，調整對內、對外政策。<sup>53</sup>阿爾巴尼亞的霍查，和羅馬尼亞的西奧賽古都是狂熱的史達林主義者，堅守社會主義道路。阿爾巴尼亞以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護衛者自居，先後反抗蘇共、中共、南共的「修正主義」路線。<sup>54</sup>羅馬尼亞和蘇聯有主權紛爭，兩國關係貌合神離，1989年無視於東歐民主化浪潮，重申不讓資本主義越雷池一步。<sup>55</sup>

意識型態「類型二」也是許多共黨國家曾經歷過的類型，例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1930年代的蘇聯。毛澤東的個人權威使他享有路線主導權，凝聚黨內共識進行改造。Goldstein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國結構屬於一種階層式的「優勢政治」(bandwagon)，由毛澤東擔任「上位行動者」掌握最高權威。<sup>56</sup>鄒讜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仍擁有極端的政治權威，政治結構不是無政府下的權力平衡。<sup>57</sup>1957年以後，毛澤東因為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以及國內政治事件的影響，<sup>58</sup>轉向喚醒民眾的階級意識，從上層建築和意識型態來發展生產力，推動以理想改造社會的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文革時期在所有制問題上提出「窮過渡」，把社會主義的自留地、家庭副業、集市貿易等都認為是「資

---

<sup>51</sup> Sandor Halebsky, *Cuba in transition: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Westview Press, 1992), pp.47.

<sup>52</sup> 程映紅，*卡斯特羅傳*（香港：明鏡出版社，1999年），頁407、410-411。

<sup>53</sup> 任明，「金正日時代朝鮮政治經濟前景展望」，*東北亞論壇*，1998年03期，頁30-34。

<sup>54</sup> 洪茂雄，*東歐變貌*，頁227-233。

<sup>55</sup> 洪茂雄，*東歐變貌*，頁177-178。

<sup>56</sup> Avery Golstein, *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Structure Constrains and Politics in China, 1949-1978*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1991), pp.29-64.

<sup>57</sup> Tang Tsou, "Chinese Politics at the Top: Factionalism or Informal Politics?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or a Game to Win All?" *The China Journal*, no.34 (July 1995), pp.128-152.

<sup>58</sup> 見毛澤東，「在省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頁330-362。

本主義尾巴」而強行砍掉，城鄉個體經濟也被取消。據 1978 年統計，在工農總產值中，全民所有制經濟占 59% ，集體所有制經濟占 41% 。<sup>59</sup>個體工商業者從建政初期的 900 萬人，到 1978 年大陸僅剩 15 萬人左右。<sup>60</sup>

蘇聯史達林在 1930 年代揚棄新經濟政策，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在某種程度上獲得了黨內共識。新經濟政策雖然獲得一定的成效，但被認為是對革命的背叛和理想主義的幻滅，黨內多數人的心中「左」的理想性還是很高，在兩年內共青團一半團員和很多黨員紛紛退黨。<sup>61</sup>用蘇聯學者齊普科的說法，「史達林比列寧更能討好大多數黨內積極份子、大多數的蘇維埃知識份子。列寧晚期拋棄了對純潔社會主義的信念，使黨內大多數理論家大失所望。」<sup>62</sup>

史達林建設社會主義的進程非常快速，1929 至 1932 年一五計畫，宣布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1933 年至 1937 年二五計劃，宣布消滅剝削階級，且在 1936 年宣布建成社會主義並逐漸向共產主義過渡。1936 年 12 月 25 日頒佈新憲法（蘇聯第三部憲法），聲稱資本主義已被消滅，結束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進入社會主義專政類型。<sup>63</sup>據統計，1937 年公有制經濟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為 99.1% ，在工業總產值中占 99.8% ，在農業總產值中占 98.5% ，在商品零售額中占 100% ，在全國人民收入中占 99.1% 。工業總產值在總工農業總產值的比例，1913 年是 42.1% ，1937 年上升到的 77.4% ，1940 年上升到 85.7% 。社會階級結構也產生變化，城鄉剝削份子被消滅，1937 年只有 5% 是個體農民和手工業者。<sup>64</sup>

### 第三節、兩種引入市場機制的意識型態類型

上一節說明了在計畫經濟框架下，兩種意識型態的類型與特徵，本節接著說

<sup>59</sup> 余陶生主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 年），頁 121。

<sup>60</sup> 陳雪薇主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大事件和決策調查*（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 年 11 月），頁 302。

<sup>61</sup> 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七十年*，第一冊，頁 260。

<sup>62</sup> 王長江，*蘇共：一個大黨衰落的啓示*（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168。

<sup>63</sup> 周尙文，葉書宗，王斯德，*蘇聯興亡史*，頁 238-240、309-317。

<sup>64</sup> 江流、陳之樞主編，*蘇聯演變的歷史思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 年），頁 26-28。

明當引入市場機制後，意識型態所呈現的另外兩種類型。

### 類型三：經濟上引入市場機制，但是領導人政治路線有衝突。

在典型計畫經濟出現弊端以後，領導互動路線開始有「計畫」或「市場」的衝突。有別於「類型一」是在承認社會主義價值下的建設手段歧異，「類型三」更深入挑戰社會主義本質，爭論是否應採取突破社會主義框架的市場化改革。此類型的意識型態特徵有二，第一，領導人有鑑於傳統計畫經濟的弊端而進行改革，試圖引進市場機制尋求解套。本章第一節已經指出，共產國家採行的公有制和計畫經濟，會導致缺乏激勵機制和資訊不完善等弊端，造成經濟效率低落。爲了突破這個困境，開始有改革派的領導人構思引入市場機制來解決。

第二，改革會引起黨內其他路線人馬的反彈，使意識型態會隨著改革派或保守派的勢力消長，而呈現左、右的擺盪現象，向市場化的調整幅度時而緊縮時而寬鬆。在傳統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中引入市場機制進行調整後，雖然能使經濟產值提升，但這種「走資」的方式必然和傳統意識型態有所衝突。此時意識型態既要爲共黨領導地位的合法性作出詮釋，又要爲改革提供理論武器，但是這兩個任務是相互矛盾的。<sup>65</sup>派系鬥爭以對馬列主義的不同解釋，來掩飾攫取政治權力的企圖，意識型態的變動往往反映出權力均衡的變化。<sup>66</sup>意識型態在落實到具體的路線、方針與政策時，黨內不同派系將之與政治權力相結合，於是黨內意識型態之對立與矛盾也就越演越烈。

意識型態屬於「類型三」的例子，發生在領導人設法突破社會主義框架進行改革的類型，有匈牙利、南斯拉夫、1980年代的中國、蘇聯、和越南。匈牙利從1960年代以後開始進行改革，改革過程保守派和改革派鬥爭激烈。1968年蘇聯扶植的傀儡領袖卡達爾（Janos Kadar）試圖以經濟改革提昇人民的支持，推行「新經濟機制」（New Economic Mechanism, NEM），引進市場機制，用政府的間接控制

---

<sup>65</sup> 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Excellent Culture Press，2004年），頁26。

<sup>66</sup> 鄭竹園，**大陸政經巨變與中國前途**（台北：五南出版社，1993年3月），頁73。

體系（indirect bureaucratic control）來替代直接干預，市場價格與計畫價格並存，逐步成立私有企業。<sup>67</sup>但是 1973 年保守派借捷克的「布拉格事件」，反對繼續改革。<sup>68</sup>1979 卡達爾開始第二波經濟改革，以完全的市場化為目標，包括加大國營企業自主權、將個體戶和承包制合法化…等，但是這些政策不能提高效率，物價上漲加上政府補貼縮減，出現經濟危機。<sup>69</sup>經濟惡化使黨內鬥爭日趨激烈，卡達爾的保守路線受到抨擊，溫和改革派的葛羅斯（Karoly Grosz）聯合激進改革派的施蓋伊（Imre Pozsgay），在 1988 年將卡達爾等保守派驅逐出黨。1989 年施蓋伊（Imre Pozsgay）在驅逐葛羅斯後掌權，推行政治民主化運動，匈共十四大更名「匈牙利社會黨」，放棄共產主義和一黨專政，1990 年國會大選失利，共黨統治結束。<sup>70</sup>

南斯拉夫在狄托晚期進行的改革逐漸脫序，加上後繼者陷入政治鬥爭中，無法解決政經困局，導致國家解體。狄托在 1960 年和 1970 年先後實行「市場社會主義」和「契約社會主義」，將市場機制引入公有制，藉由市場帶來競爭和效率，保留社會主義所有權，商品價格由商業組織之間協定。<sup>71</sup>但由於產權模糊，形成既無計畫、也無市場的混亂狀態，在 1980 年代形成嚴重經濟危機。狄托死後缺乏像他一樣的強力領導者來統一多民族的南斯拉夫聯邦，加上遺留下來的憲法體制複雜不清，集體領導制和輪流主政制在各自利益考量下難以達成共識，無法解決日益惡化的經濟和民族問題，南共於焉分崩離析。<sup>72</sup>

中國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先後引起「凡是派」和「保守派」的反彈。毛澤東追求人民公社與企業國有化的建設，結果造成經濟發展嚴重倒退的慘痛代價。毛澤東逝世後，華國鋒與鄧小平兩派人馬在意識型態路線上出現分歧，華國

<sup>67</sup>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頁 30-31。

<sup>68</sup> 洪茂雄，**東歐變貌**，頁 94-95。

<sup>69</sup> 吳玉山，**共產世界的變遷**，頁 100-101。

<sup>70</sup> 尹慶耀，**東歐集團研究**（台北，幼獅，1994 年），頁 264-266。

<sup>71</sup> 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頁 28-30。

<sup>72</sup> 洪茂雄，**東歐變貌**，頁 200-205。

鋒繼承毛的路線倡導「兩個凡是」；鄧小平則認為應該捨棄「繼續革命論」轉向經濟建設路線。這場意識型態的論爭最終是鄧小平獲勝。1978年12月，中共舉行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體會議公報揭示1979年後的主軸將從階級鬥爭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但是鄧小平的改革並非一帆風順，1980年代仍引起黨內保守派反彈。鄧小平陣營的「改革派」主張市場經濟，而陳雲陣營的「保守派」堅持計畫經濟，兩個陣營的路線分歧，使1980年代的中共意識型態忽左忽右，沒有明確的發展路徑。改革派在1980年代末期遭遇最大的考驗，1988年9月十三屆三中全會，提出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針。決定從1989年起，用兩年或更長的時間，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政治氣候轉趨保守，中共在1989年下半年度採取治理整頓、經濟緊縮政策，開始有「查大戶」、「補罰偷漏稅款」等不利私營經濟的措施。<sup>73</sup>針對這樣的現象，鄧小平決定為改革開放路線奮力一搏，在1992年南巡講話表態要繼續執行改革開放，加上解放軍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迫使保守派讓步，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後因為陳雲陣營幾位重量級人物先後辭世，保守派勢力大傷，市場化路線終於成為主要改革方向。

蘇聯戈巴契夫推行改革，遭遇左派和激進改革派的激烈抵抗，最終失敗垮台。蘇聯國家經濟從1970年代以後進入了15年之久的經濟停滯時期，戈巴契夫於1985年上台以後提出了引入市場機制的改革政策，1985年2月25日至3月6日召開的二十七次，制定「加速戰略」，以「加速社會經濟發展」的概念取代發達社會主義，肯定合作制、私有制、商品貨幣的重要性。<sup>74</sup>以平穩的經濟改革作為重點，改革的總體構想是充分利用商品貨幣的關係。二十七次以後通過一系列放寬經濟改革的法令，例如「蘇聯國營企業（聯合公司）法」、「國有企業法」下

---

<sup>73</sup> 武樹幟、陳吉江，「加強管理，興利抑弊」，中國國務院研究室個體、私營經濟調查組編，**中國的個體和私營經濟**（北京：改革出版社，1990年11月），頁1-20。

<sup>74</sup> 周尚文，葉書宗，王斯德，**蘇聯興亡史**，頁680-681。

放企業自主權、「合作企業法」允許成立合作社、「個體勞動法」保障個體勞動者的權益等等。<sup>75</sup>

蘇聯從 1985 年至 1991 年之間，被越來越尖銳的政治鬥爭所困擾，各個競爭集團勢力此起彼落，最後導致蘇共的垮台。<sup>76</sup>當時的路線有三：保守派、戈巴契夫為首的中派，葉爾欽為首的激進改革派。戈巴契夫上台之始，為了推動改革而進行幹部調整，將過去保守派的老幹部撤換成新成員，1985 年二十七大選舉產生的新中央委員成員有 40% 左右是第一次當選，比例高於 1939 年以來任何一次蘇共代表大會。<sup>77</sup>但是由葉爾欽為首的資本主義改革派，不滿意戈巴契夫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改革，認為應該盡快消滅社會主義體制的殘餘，用資本主義體制取而代之。改革派要求取消憲法中關於黨的領導地位的第六條，戈巴契夫妥協，在 1990 年 2 月中央全會中宣布準備放棄一黨專政，提出實行多黨制、總統制、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sup>78</sup>1990 年 7 月二十八重申蘇共放棄政治上的一黨專政和意識型態上的壟斷權。保守派反對戈巴契夫向激進改革派妥協，發動「8·19」政變，最後導致蘇共垮台。

越南改革派和保守派在 1980 年初期相互拉鋸，到 1986 年越共六大才確定改革路線。越共統一後選擇史達林式社會主義建設，推行重工業和計畫經濟，二五計劃（1976~1980）成效不彰，造成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的經濟困難，形成嚴重飢荒。<sup>79</sup> 1979 年 9 月，越共四屆六中全會推出「新經濟政策」(NEP)，決議暫緩社會主義改造。然而新經濟因為改革配套不完全，引發通膨及黑市猖獗等問題，越共當局乃於 1982 至 1983 進行「治理整論」，再度提高國家計劃權力，改

<sup>75</sup> 邢廣程，**蘇聯高層決策七十年**，第五冊，頁 16。

<sup>76</sup> David Kotz and Fred Weir 著，曹榮湘等譯，**來自上層的革命**（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82。

<sup>77</sup> 丁篤本著，**蘇聯政體與官制史**（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260。

<sup>78</sup> 邢廣成，**蘇聯高層決策七十年**，第四冊，348-351。

<sup>79</sup> 馬櫻，「論越南革新的發軔」，**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97 年第 3 期，頁 24-25；白石昌也著，吳瑞雲、田川雅子譯，**越南：革命與建設之間**（台北：月旦出版社，1995 年），第三章、第四章，頁 127-196。

革派阮文靈下台。但治理整頓並不能解決經濟的困局，在這段期間出現第二次經濟危機。1986年越共六大，領導層產生變動，原本的總書記長征、總理范文同、黎德壽離開政治局，由改革派的阮文靈出任總書記。<sup>80</sup>阮文靈提出「革新」的口號，宣布當前是屬於「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初級類型」，從計畫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採用多種成分的經濟體制，但同時也警告不可引向資本主義道路。在政治改革方面，認為不應該匆促的實行政治改革，也不必建立多元化、多黨制。<sup>81</sup>

#### 類型四：經濟上引入市場機制，領導人政治路線也有共識。

在經濟上引入市場機制，政治路線共識的情況下，經濟處於相對穩定的狀態，發展的成果越來越大，意識型態與社會發展現實之間的矛盾也加劇，因此意識型態論述的轉變代表解決這種矛盾的嘗試。此時意識型態是為現實政策服務的，需要修正的是意識型態而非犧牲現實。<sup>82</sup>因此這個類型的意識型態特徵有二，第一，意識型態需要符合現存的經濟社會現實而修正。第二，經濟社會現實相對的形成推動由下而上改革的力量。

首先看第一個特徵，意識型態需要符合現存的經濟社會現實。計畫經濟體制引入市場經濟的成分，無形中架空了過去共黨政權以計畫經濟控制社會的能力。加上「轉軌」產生實質成效，市場機制順利刺激經濟發展，使意識型態朝資本主義修正的方向獲得領導人和民眾的普遍認可，進而推動下一波意識型態更朝市場化方向修正。

計畫經濟向市場化的「轉軌」順利與否，和推行市場化改革的領導人本身的權力來源有關。在制度建立的類型，具有個人權威的領導人容易達成新制度的建立；而依賴職務權威的領導人卻難以打破既有制度的規範。當試圖推動市場化改

---

<sup>80</sup> "Political Bureau Members in December 1986," in Ronald J. Cima edited, *Vietnam: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D.C.: The Division, 1st ed, 1989). [http://lcweb2.loc.gov/frd/cs/vietnam/vn\\_appnb.html](http://lcweb2.loc.gov/frd/cs/vietnam/vn_appnb.html); Sar Desai 著，蔡百銓譯，*東南亞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年），下冊，頁528。

<sup>81</sup> 張訓常，「前越共總書記阮文靈的改革思想」，*世界經濟與政治*，1998年第10期，頁73-74。

<sup>82</sup> 鄭永年，*政治漸進主義：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前景*（台北：吉虹資訊：2000年），頁59-60。

革的領導人，本身不具備革命建國的歷史功勳，而仰賴職務所賦予的權力時，他很難抗拒改革時所遭遇的阻力。相反的，若推行市場化改革的領導人，是具有個人權威的革命元老時，就較能壓制黨內其他路線的反對聲浪，並延續自身的政策路線。因此，「類型四」並沒有出現在所有的共黨國家之中，如果共黨國家在進行市場化改革時遭遇的阻力很強，領導人沒有能力貫徹改革順利引入市場機制的話，那麼在原有的計畫主義框架下，經濟社會的發展仍無法擺脫無效率的困境，自然無法產生經濟成長，和伴隨而來的民間社會的改革要求。

舉例來說，中國改革開放路線沒有在鄧小平死後遭到揚棄，反而逐漸步入「深化」，和鄧後領導人本身有意延續，以及只具有職務權力，無力改變市場化路線有關。1980年代雖然因為鄧小平和陳雲兩位大老的鬥爭勝負未定，而無法確立改革的方向，但是1992年鄧小平與解放軍站在同一陣線為改革開放扳回一城，加上陳雲陣營人士凋零使抵制聲浪後繼無力，終於延續改革開放的路線。鄧小平之後的領導人已經不具有戰爭功勳的光環，在職務權威之下難以推翻既有的路線，即使江澤民不想繼續鄧小平之路，也無法憑藉個人意志推行政策主張。更重要的是，江澤民沒有改變經濟發展路線的藉口，因為自從改革開放以後經濟起飛的成效顯著，造就了許多受益者，這些成果內化到民眾和幹部的認知之中，相信改革開放的路線是正確的。在路線獲得普遍支持的情況下，江澤民還是必需沿著鄧小平所規定的路線前進。

越南「革新」路線的確立，也是由革命元老阮文靈所推行。阮文靈是革命出身，1936年加入印度支那共產黨（今越南共產黨），1945年開始在南越從事領導工作，歷經1954年抗法的奠邊府戰役、抗美戰爭，對越南的統一貢獻巨大。1986年越共六大，是改革派獲得多數支持的大會，連過去較為保守的黎筭和長征也都表態支持改革，使六大確立的改革路線順利延續。1991年6月越共七大，患病的阮文靈卸任總書記，擔任越共中央顧問，到阮文靈1998年4月過世之間，越共的改革路線不斷深化。七大通過《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國家建設綱領》，建立「由

國家管理和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體制」，讓改革進一步深化。<sup>83</sup>1996年6月八大，延續七大路線堅持革新開放，和反對政治多元化與多黨制，堅持共產黨的領導。<sup>84</sup>2001年九大進一步形成「社會主義方向市場經濟」框架。<sup>85</sup>

相反的，蘇聯戈巴契夫的改革失敗，就進一步驗證了領導人權力來源不同，將會影響改革推行的結果。戈巴契夫不具備革命建國的功勳，在政策推行時往往要與其他派系妥協。1990年3月成立總統委員會，實際上取代了蘇共中央政治局成爲最高決策機構，蘇共在國家政治體制的地位和作用嚴重削弱。<sup>86</sup>7月2日至13日二十八大，新黨章規定直接選舉總書記和副總書記，戈巴契夫雖然當選爲總書記，但是政治局選舉中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產生的政治局委員中只有戈巴契夫一人繼續當選，<sup>87</sup>他在二十七次拔擢的人員都落馬。黨章中更規定蘇共中央政治局不再是蘇聯最高決策中心，加上刪去了憲法中規定蘇共領導的第六條，使蘇共喪失在社會中的領導地位。

此類型的第二個特點，是社會將形成另一股推動改革的自主力量。當計畫經濟順利向市場化「轉軌」以後，國家等於放下了過去完全掌控在手中的控制權，社會中的私營經濟成爲合理的存在。並且由於國家領導人對於繼續市場化的改革路線具有共識性，因此私營經濟將會隨著政策而逐步擴張。在私營經濟合法存在且重要性日漸上升的情況下，必然和原始社會主義的教條漸行漸遠，但國家卻已經喪失了過去對社會的控制力，不止無法輕易中斷市場化的趨勢，還必需正視私營經濟主的政治要求。這樣將使共產黨自詡爲「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口號名不實，必需轉而擴及更有生產力的階級。

---

<sup>83</sup> Douglas Pike, "Vietnam in 1991: the turning point," *Asian Survey*, vol.32, no.1 (January, 1992), pp.78-79.

<sup>84</sup> Brantly Womack, "Vietnam in 1996: reform immobilism," *Asian Survey*, vol.37, no.1(January, 1997), p.84; 梁楚，「越南共產黨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當代世界*，1996年第8期，頁8-9。

<sup>85</sup> Carlyle A. Thayer, "Vietnam in 2001: the ninth party congress and after," *Asian Survey*, vol.42, no.1 (January, 2002), pp.81-83; 張向斌，「智慧、民主、團結、革新的越共九大」，*當代世界*，2001年05期，頁17。

<sup>86</sup> 周尙文，葉書宗，王斯德，*蘇聯興亡史*，頁696-697。

<sup>87</sup> 丁篤本著，*蘇聯政體與官制史*，280。

現存共黨政權中，中共和越南皆已進入「類型四」，其中改革較久、深度較廣的中國社會已經出現由下而上推動改革的力量。<sup>88</sup>中共 2000 年所提出的「三個代表」吸納資產階級，可說是中共體認到社會壓力的表現。最後，由本章分析可見，「三個代表」的論述在過去共黨國家的發展中是前所未見的，也已經超越現存共黨國家的定位，這就是本文第一章所提出的中共統治合法性產生變遷。

以上說明了「經濟結構—引入市場機制與否」和「領導互動—路線衝突與否」兩個變數相互作用下，造成四種意識型態特徵各異的四種類型，下一節為本章小節。

#### 第四節、小結

本章採取比較研究的方式，建構出解釋共黨國家意識型態演變的分析架構。目的是試圖在建構理論之後，能更精準且深入的瞭解中共意識型態的演變軌跡，同時呼應本論文對中共統治合法性的關注，探討中共「三個代表」出爐的背景原因。

本文認為意識型態的演變和「經濟結構—引入市場機制與否」和「領導互動—路線衝突與否」兩個變數有關。由於傳統計畫體制的本質會導致無效率的弊端，若無法從市場機制尋求解套則難跳脫困境，而市場的引入勢必引起高層路線的分歧。

經濟與政治的互動結果導引出意識型態發展的四種類型。類型一：經濟上採取完善控制計畫經濟，但是領導人政治路線有衝突。特徵是領導人在承認社會主義的價值框架之下，對建設社會主義的速度和方式有所爭論。同時意識型態的論述也經常成為領導人的施政口號，只有文字上的差異，但不會落實到現實社會之

---

<sup>88</sup> 越南的改革時間比中共晚 8 年，市場化程度還不及中共，政治控制也較嚴謹。1988 年 10 月，越共宣布其他兩個政黨（越南民主黨、越南社會黨）停止活動，越南共產黨成為國家的唯一政黨。越南目前雖然尚無類似「三個代表」的論述，但是本文假設越南市場化更加深化後，也會朝此方向演變。驗證之結果將另闢專文探討。

中。1960 至 1970 年代的中國，以及 1920 年代、1960 年代的蘇聯屬於此類。類型二：經濟上採取完善控制計畫經濟，領導人政治路線也有共識。特徵是領導人以建設共產天堂的理想來改造現實，呈現高度動員、大規模公有制，和強調極端平等的特色。強人領導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如古巴、北韓、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以及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1930 年代的蘇聯屬於此類。

類型三：經濟上引入市場機制，但是領導人政治路線有衝突。特徵有二，第一，領導人鑑於傳統計畫經濟的弊端而進行改革，皆試圖引進市場機制尋求解套。第二，改革皆引起黨內其他路線人馬的反彈，使意識型態會隨著改革派或保守派的勢力消長，而呈現左、右的擺盪現象。1950 年代的南斯拉夫、1960 至 80 年代的匈牙利、1980 年代的中國、蘇聯、和越南屬於此類。類型四：經濟上引入市場機制，領導人政治路線也有共識。特徵是逐步脫離原始馬克思主義，轉向服務於經濟社會的現實，而且社會逐漸形成推動改革的自主力量。1990 中期以後的中國、越南屬於此類。

最後，本文特過跨國比較的觀點，得出中共 2000 年所提出的「三個代表」，在共黨國家意識型態發展中的特殊性與重要性。從這四種類型更可以明顯看出，中共 2000 年提出的「三個代表」，已經超越了其他共黨國家過去意識型態的發展類型。「三個代表」是在保留共黨統治下突破社會主義框架的轉變，經濟社會現實使領導人認知到，再自稱是「工人階級先鋒隊」將會出現畫地自限的危機，故透過「全民黨」和「執政黨」的論述擴大統治範圍，改變了統治合法性的基礎。下一章將從貫時性的角度，勾勒中共意識型態演變的軌跡，說明「三個代表」在中共歷史中的獨特性。